



# 我國女性軍人百年來的發展與現況

文 | 周海娟 |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圖 | 智庫文化出版社提供

## 一、前言

在男性身體與男子氣概（masculinity）實務的基礎上，軍隊被界定為由男性及其規範所壟斷的霸權男子氣概（hegemonic masculinity）制度。男性與男子氣概原本就是軍隊中不言自明的典型標準，由於這樣的規範長久宰制軍隊制度，根本不需要任何額外的詮釋。男子氣概當然不需要被一再地主題化，相反地，只要透過持續鞏固軍隊制度，就能夠不斷地複製男子氣概的規範（Connell, 1995, pp.212）。軍隊因強烈的霸權男子氣概，使得女性軍人往往因「女性」受到不同的待遇，卻沒有因

「軍人」而得以成就「保護者」的角色。

自1970年代起，許多國家為了合法性的理由而開放女性從軍之路（沈明室譯，Addis, Russo & Sebesta原著，1998，第四章），我國的女性從軍史在民國以前的史料部分，均集中在幾個帶有個人英雄色彩的描述，有些是個人直接參軍，有些則是為夫或為父而投入軍隊，前者可視為主動積極的從軍者，後者可看成道德取向的助戰者。民國以後，從北伐、抗戰至國府遷臺，女性軍人百年來的發展其實可視為女性投入勞動市場的小縮影，也標示著女性職業選

擇的重大轉變。

在軍隊中，男性及其性別是一個不曾被提及的議題，男性是「軍人」(soldiers)，而女性則成為「女性軍人」(female soldiers)；女性有性向(gender)和性別(sex)，而男性則無。許多的經驗研究一再強調：女性處於一種結構上曖昧的位置，因而使得她們必須面對一個根本的兩難問題。亦即，一個人可以真的是一個軍人也是一個女人，而不會被視為脫離了所謂軍人或女人的常軌嗎(Herbert, 1998, pp.10)？某些研究者主張：在軍事組織中普遍存在的男子氣概意識型態，比起特殊的制度或人際限制，它更有效地限制了女性軍人的參與(pp.6)。本文因篇幅所限，不擬在理論上做詳細的討論，而將焦點放在從早期的婦女參與軍隊服務到現今的制度化女性軍人，百年來女性在軍隊發展的軌跡。首先，簡要回顧民國以前的女性參軍經驗；其次，檢視民初到抗戰期間女性在軍中的角色；最後，討論政府遷臺後女性軍人的專業化發展過程。

## 二、民國以前的女性參軍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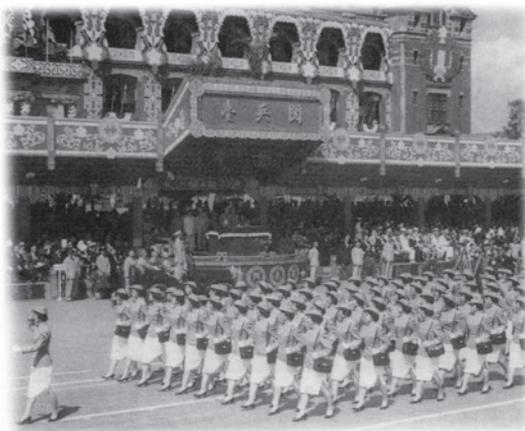
對許多女性主義者而言，父權制(patriarchy)是造成兩性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之一，女性在社會上的不平等地位與被壓迫均應該獲得解放，所謂解放

是指能確保兩性公平參與社會生活的一種社會重組。建構論(constructionist theories)因而認為，性別差異與不平等是社會建構的，並非天生自然的，性別不平等乃人類意圖(human intention)的產物，並非結構本身使然，是由社會行動者透過互動的過程而給予人們各種不同的機會與限制。當人們在回應這些機會與限制時，同時再創造(recreate)結構，換言之，這是一個不斷再建構的過程(周海娟, 2004)。

民國以前的女性參軍經驗，可算是女性進入公領域的啟蒙時期。雖然史料的記載中女性仍以身為男性附屬者的角色居多，但自甲午戰後，女性的自主性開始露出曙光。由女性知識份子帶頭參與革命活動和武裝行動，就埋下了未來改變、再建構既有性別秩序的可能性。

### (一) 辛亥革命以前的史料記載

楊績蓀(1964)在《中國婦女活動





記》一書中，彙整見諸於史書的記載，自晉朝以降至明末清初，羅列了20位直接或間接參與軍隊的女性事蹟。明末清初，由於太平天國時期獨特的男女平權思想，而使得婦女在軍事地位上有了革命性地轉變，女兵約有十萬人之多，也因而出現曾率領女兵部隊達十萬之眾的「女元帥」洪宣嬌（鮑家麟，2000，頁59）。

然而，這些史料所顯示的婦女與軍隊的關係，多半呈現出一種以協助男性（父親或丈夫）建立功蹟而受到社會關注與表揚的傳統女性價值取向，這些女性具體展現出身為父權體制下的附屬角色。與其說這些史料證明女性曾在軍隊中佔有一席之地或曾有耀眼的戰蹟，倒不如說即使女性曾經在軍事上有突出表現或有表現的機會，仍敵不過父權體制對女性的社會角色期待與安排（鮑家麟，2000，頁65-67；周海娟，2004）。

## （二）辛亥革命與婦女參與軍隊

清末民初可說是我國婦女史上一個重要的時刻，這個時期不但是婦女地位

產生巨變的時期，也是我國女性開始以自己的力量登上軍隊大舞台的時刻（周海娟，2004）。自甲午戰後，中國婦女的生活開始產生重大的轉變，其中影響最大者，應屬女性知識份子的出現，以及女性知識團體的成立。

辛亥革命之所以被視為女性加入革命的分水嶺有三個理由：第一，辛亥之前，婦女加入革命活動多為個人參與；在辛亥之後，婦女革命團體陸續出現。第二，女性參與的革命活動範圍擴大，以往多以宣傳和教育為主，辛亥後，則幾乎所有的活動均有所涉入。第三，初期參加革命的婦女以知識份子為主，辛亥之後，有不少家庭主婦、女工、女學生等都加入了革命活動。而且，其活動範圍除了宣傳與革命教育外，還包括募捐、勤務、掩護聯絡、起義、運輸、暗殺與偵探等工作（陳東原，1970，頁315；林維紅，1981）。

大體而言，此時女性加入革命顯示出三個重要的社會意義：第一，由於革命的目的，而不斷進行意識覺醒的工作；第二，象徵社會風氣的逐漸開放，女性不僅從私領域走向公領域，而且同時正式且有規模地進入了傳統上幾乎為男性獨佔的「戰爭／革命」；第三，當時的革命婦女已具相當的教育程度，皆多為當時的知識分子，代表女性的教育水準已逐漸提升（周海娟，2004）。



### 三、從民初到戰時 婦女動員

從民國前至抗戰時，雖然女性參與公領域的範圍逐漸擴大，但這只不過是父權制公共化（Walby, 1990）的產物，亦即，在公共化父權制中，雖然女性得以進入公領域，但卻是居於從屬地位。儘管抗戰時期有計劃地招募、訓練從軍的女青年，但部隊分派給她們的職務，大致上並沒有脫離發揮「女性特質」的工作。當時，軍隊中的性別配置，其實只是外在社會性別秩序的複製。

#### （一）家務勞動公共化

辛亥革命後，有許多性質上屬於軍事組織的女子愛國團體，同時，組織女子軍隊的風氣甚盛（林維紅，1981，頁322-324；鮑家麟，1981，頁377）。表面上，似乎女性在軍隊中逐漸嶄露頭角，其實不然。這些女子軍隊不僅程度參差不齊，也沒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和嚴密的組織形態。雖然，這些女子軍隊的實質貢獻相當有限，但就女性的參軍經驗而言，有著重大意義：第一，女性參與軍隊未必是普遍的女性意識覺醒，但至少象徵婦女生活拓展到公領域的啟蒙；第二，這個轉變意味著女性打破婦



女屬於家庭角色的傳統，也醞釀著未來可能的更大轉變；第三，組織女子軍隊是女性自主性的展現（周海娟，2004）。

更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女性受到私有化父權制（Walby, 1990）的束縛，鮮有女性自覺或近代婦女運動所謂「意識覺醒」的行動。自辛亥以後，父權制有了較明顯的轉化跡象，不僅女性知識份子本身透過實際公開地參與行動，論述女性與政治、國家的關係，展現意識覺醒的行動，而且這些行動也受到部分男性的支持與鼓勵。

在抗戰期間，婦女所扮演的角色實仍以後勤支援和前線救護的工作為最主要的形式。然而，女性在參與軍隊的角色定位上卻更顯多元化，且自主性更高、參與層面更廣、參與者也更普及於一般婦女，而非僅以女性知識份子為



主。根據學者研究，當時有高達819個婦女團體投入抗戰行列。雖數量不少，但大多數團體的主要目的和功能，仍不脫女性特質的照顧者角色為多，包括蔣夫人宋美齡在民國27年5月所提的《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工作大綱》，都可視為最系統化且有力的動員婦女，發揮女性特質，投入抗戰。然而，這很明顯是家務勞動的公共化；換言之，在一個以男性為主的軍事團體或行動中，女性主要仍被安置在一個富有女性特質的角色上，就軍方而言，並沒有正式招募女性到前線服務。

民國29年6月成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女青年處，可算是此期間內有計劃招募女青年，且施以軍事訓練的組織（梁惠錦，2000，頁309-315）。雖然，抗戰期間婦女團體或組織都沒有明顯參加武裝戰鬥的經驗，但仍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和實質的意義：一是象徵女性具有參與軍隊動員和軍隊任務的能力，一是為日後女性正式進入軍隊編制奠定實質的經驗和基礎。尤其，這個時期許多為婦

女開設的訓練課程，提供了未來女性更進一步挑戰軍事組織對女性軍人位置安排的機會。

## （二）從後方走向前線

儘管，抗戰初期並沒有正式招募女軍人到前線服務，但仍有一些女性武裝組織零星散佈，雖然不是直接面對武裝行動，但也是穿軍服（甚至可配武器）在第一線為戰士與民眾服務（沈明室，1997）。民國31年，軍委會政治部頒佈「女子參加戰役傷亡撫卹條例」，其中對因參戰而傷殘及殉難婦女有多項優待辦法。由此，我們也可推測當時婦女參戰者人數之多，已到達政府必須制定相關法令的程度。

民國33年底，中央頒佈「全國知識女青年服務隊徵集辦法」，一時興起婦女從軍的風潮。次年，西北及西南志願從軍的754名女青年在此報到。這個總隊可視為我國第一支正式賦予番號、任務的女性軍職人員。之後，這個總隊被編入青年軍二〇一到二〇六師（梁惠錦，1991，頁377；2000，頁384-387；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2001，頁233-274；沈明室，1997）。

整體來看，在一連串巨大的社會變遷後，軍隊本身高度排他性的體系不僅受到重大衝擊，同時，著眼於女性特質的可利用性，軍隊擴大對女性的接納。

因此，在女性進入軍隊後，「自然」被納入了這個必要但從屬的位置，儘管，她們沒有太多的升遷機會，也沒擁有太大權力，但是她們已經正式地進入軍事組織。

#### 四、國府遷臺後的發展

Kronsell (2005, 285) 認為，在原本性別界線嚴明的組織中，例如軍隊，一旦有女性進入其中，組織的性別體制將受到挑戰與衝擊。例如，瑞典陸軍常使用一些有性暗示的字眼，女性進入陸軍服役後，無形中對語言產生了重塑的效果。我國女性軍人的發展，或多或少也顯現了Kronsell所描述之軍事組織受到的挑戰與衝擊。整體社會環境的變遷，以及女性軍人本身的自主性與能動性，都提供了對軍隊性別體制再建構的動力。

##### (一) 正式的女性軍人編制

民國37年底，孫立人集訓的青年軍，前後錄取男性7,000名，女性400餘名，男生設教導總隊，女生則成立女青年大隊，直屬陸軍訓練司令部，民國43年改隸國防部。首批女青年在38年3月抵臺，共99人，此後三個月內共有7批來臺。她們輾轉被送至屏東阿猴寮受訓。訓練內容包括為期六個月的入伍訓練，其次是為期

一年的分科教育專業訓練。專業訓練分為：軍事服務、軍隊衛生、社會教育，以及兒童福利四組（張文萃，1985）。

民國39年10月，女青年大隊結業，納編入國防政工體系，再施以六週的政治思想訓練，年底，更名為「國防部女青年工作一～六隊」，巡迴各軍工作。至民國45年，改稱「國防部女青年工作大隊」，編有五個中隊，由總政治作戰部督導，屬三軍的輔助部隊。

臺澎金馬自823炮戰之後，便沒有經歷過實際的戰爭，因此，女青年工作大隊的任務就聚焦在敦睦軍民關係、疏導官兵情緒、從事前線心戰喊話，以及政治教育等活動（胡瑞珍，2000，頁130-134）。之後，女青年工作大隊改制為女青年工作中隊，雖然工作精神仍維持著當年的傳統，但其組織及編組皆已大幅簡化。至今，女青年工作中隊也已裁撤，原有的女性軍人回歸各軍種的編制。





## （二）現代女性軍人的崛起

現代女性進入軍隊是制度化建軍的一環，而非以往個人英雄主義式、理想化的從軍行動。自民國80年起，國軍開始在各軍事院校擴大招收女性。先是各軍種於民國80年擴大招收女性專業軍士官，之後，陸、海、空軍官校於83年全面招收女性學生。87年之後，陸、海、空軍官校的女性正期班畢業生，陸續進入部隊服役，女性軍人的人數也由最初的千餘人增加到目前的超過萬人。

女性軍人在進入部隊後，依專長分配，她們的兵科專長分類從以往的政工及護理兩項，增加到20餘項之多，包括航海、飛行、財務、修護、土木、通信、兵工、補給、資訊等領域。不僅角色與專長均朝多樣化，一些較為專業性的職務，如：工兵、通信等戰鬥支援兵科、航海及飛行等都已開放給女性軍人。然而，因當初晉用女性軍職人員

時，多數軍種並未規劃其升遷管道中必要的學經歷管制，以致目前面對多數中高階女性幹部的晉升時，會遇到軍事學經歷不足的瓶頸。國防部未來若能擴大並落實經管歷練的管道，則女性才有更多元的發展空間與公平的晉升管道（林美慧，2001；周海娟、崔艾湄，2003）。

我國女性軍人制度擴大實施迄今已有20年，國軍除將定期招收專業女性軍、士官外，三軍官校亦持續招收正期班隊的女性學生。民國90年開始全面分發至師級單位，另依個人志願亦有分發至外島服務者。就目前政策而言，三軍官校畢業的女軍官需先依循正常歷練管道：在一般部隊擔任排長、輔導長之職務或上艦歷練航海職。種種的調整與人事變動都在告訴我們這樣的事實：女性已經進入軍中，而且她們正循著制度化的模式，企圖在男性的世界中走出她們的路。（周海娟、崔艾湄，2003）



如果我們從軍事組織結構來看，目前，男性軍人有非常完整且程序化的經歷管制（即升遷管道，簡稱「經管」），他們很清楚個人在組織中的地位、未來發展，以及如何在組織中取得機會和權力。對女性軍人而言，雖然也有經管，但有時卻無法落實。根據作者直接訪談部分現役女性軍人的結果，女性軍人的經管沒

有落實的原因頗多，但最主要的兩個原因其實是直接與軍隊組織本身有關：第一，基層連隊沒有足夠女性軍人歷練的位置；第二，某些連隊沒有適合女性軍人居住的空間。前者所透露的訊息是：玻璃天花板的問題在軍中似乎處處可見，軍方尚未對女性軍人開放所有的職缺；後者則可反映：雖然現在有愈來愈多的女性進入軍中服役，但性別的問題顯然未受到足夠的關注，多數的設施仍以男性需求為考量。

儘管現階段女性軍人服役過程中，仍會面臨性別差異所造成的窘境，但不可否認的，軍隊本身早已知覺到性別差異所帶來的衝擊。國軍近年來持續增加女性軍人的員額、增加女性軍人的歷練機會、推動性別主流化、許多相關法規的頒布與實施、對女性開放更多元化的職務，以及性別教育課程的實施等措施來看，的確可以看到一些改變的跡象，也可視為軍隊對軍中性別議題的回應。當然，這只是一個開始，未來仍有待更多、更積極的努力。

## 五、結論：女性就業的新選擇



2009年校園徵才新聞顯示現代女性欲加入國軍行列的意願頗高。圖為剪報資料：〈校園徵才 國軍招募諮詢 女比男多〉，2009/5/7，《自由時報》，版A7。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女性軍人的確已經不再是過去軍隊「參與者」的角色，她們儼然已是軍隊的一份子，有著與男性軍人一樣的軍事社會化過程。儘管如此，女性軍人並沒有因為表面上的一視同仁，而能在軍隊這個職場得到公平的升遷機會。男性軍人一則認同女性在軍中應有平等的權利，但卻又不願放棄既有的利益與場域，因此呈現出一直沒有落實的女性經管制度。如果我們將之較諸於外在的大社會結構，其實不難發現兩者竟有著如此雷同的版本，儘管兩性平權的概念已是一種普遍接受的社會價值，但是，在現實生活裡卻未必如此。

其次，女性軍人的興起與制度化發



展，可視為女性挑戰傳統男性職業的最佳典範，就社會上常見的職業類別而言，應該沒有比「軍人」更具性別刻板印象的職業。吊詭的是：當女性進入男性為主的職場之後，她們的困境與所有職業婦女的一樣——既要致力於工作上的表現，又得尋求家庭與工作間的平衡點，「職業婦女蠟燭兩頭燒」的窘境，同樣出現在女性軍人身上。軍職固然為家庭帶來穩定的收入，但如何能使家庭成為軍職的砥柱，則是現代女性軍人努力的目標。面對這樣的看法，我們的疑問是：似乎較少聽到男性軍人為了找尋家庭與工作的平衡點而倍感困擾，相反地，配偶無私的支持與照顧家庭，成為男性軍人得以安心工作的重要來源。

傳統上，軍公教被認為是安穩、有保障的職業選擇，女性擔任公職或教師似乎是順應社會性別角色期待的產物。如今，女性正式投身軍旅，成為職業軍人，她們在一個充滿男子氣概的職場與男性並肩工作。儘管女性軍人未必要將自己男性化，軍隊本身也不易在短時間內轉變其充滿陽剛氣息的环境，但是，我們可以預期的是：軍隊職場將因女性軍人的逐步增加，而弱化其原有的霸權男子氣概，同時，必須更積極地回應女性軍人的需求。雖然，現代女性軍人依然面對許多軍隊職場有待改善的問題，但女性軍人的崛起，無異也帶來更多值得討論的議題。如果，我們只著眼於

她們目前所遭遇的問題，而將責難指向軍隊體制本身或男性軍人的既得利益，那未免窄化了女性軍人議題本身的複雜性、小看了女性軍人多年來的努力成果，以及軍隊本身的能動性。至少，我們可以說：女性軍人不僅開啟了不同於以往的女性就業選擇機會，同時，也在這個新職場中，參與建構不同於過去的軍隊性別體制。

## | 參考文獻 |

- 沈明室（1997），〈戰爭與女性軍人〉，發表於第四屆三軍官校基礎學術研討會，主辦單位：陸軍官校、海軍官校與空軍官校，發表地點：高雄縣鳳山陸軍官校。
- 沈明室 譯（1998）。《女性軍人的形象與現實》。臺北：政戰學校軍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譯自Elisabetta Addis, Valeria E. Russo & Lorenza Sebesta (1994) *Women soldiers: Images and realiti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周海娟（2004）。〈從「巾幗英雄」到「職業婦女」：我國女性在軍隊中角色的歷史變遷〉。《東吳社會學報》，16：149-185。
- 周海娟，崔艾湄（2003）。女性軍人福利服務需求與資源網絡之建構。社區發展季刊，101：347-366。
- 林美慧（2001）。〈國軍部隊中女性軍士官角色定位的探討〉。<http://www.bbs.nsysu.edu.tw/txtVersion/treasure/GuardLife>。（2002/12/5 瀏覽）。
- 林維紅（1981）。〈同盟會時代女革命志士的活動〉。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集》，296-345。臺北：商務。
- 胡瑞珍（2000）。〈女青年工作大隊之回顧〉。華文第編，《木蘭風雲五十年》，130-134。臺北：智庫。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2001）。《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 張文萃（1985）。《阿猴寮女兵傳》，臺北：韜略。
- 梁惠錦（1991）。〈抗戰時期的婦女組織〉。《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臺北：稻鄉出版社。
- 梁惠錦（2000）。〈抗戰前後的婦女運動〉。陳三井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255-402。臺北：代中國出版社。
- 陳東原（1970）。《中國婦女生活史》（台三版）。臺北：商務。
- 楊績蓀 編（1964）。《中國婦女活動記》，臺北：正中書局。
- 鮑家麟（1981）。〈秋瑾與清末婦女運動〉。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集》，346-382。臺北：商務。
- 鮑家麟（2000）。〈晚清及辛亥革命時期〉。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53-156。臺北：代中國出版社。
- Connell, Raewyn. (1995). *Musculini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erbert, Melissa Shelton. (1998). *Camouflage isn't only for combat: Gender, sexuality and women in the milita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Kronsell, Annica. (2005). Gendered practices in institutions of hegemonic masculinity.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7(2): 280-298.
- Walby, Sylvia. (1990). *Theorizing patriarchy*. London: Basil Blackwell.